

摩尼教研究之展望

林悟殊*

本文回顧本世紀來摩尼教的研究史，認為在該領域的任何實質性進展，都是基於新資料的重大發現。文章著重依據八十年代以來摩尼教資料的新發現及其研究現狀，對該領域研究未來的趨向作了一般性的預測，特別是從中國學者實際出發，指出其可能突破的方位。

關鍵詞：摩尼教 中國

六十多年前，陳寅恪教授在其《陳垣燉煌劫餘錄序》中寫道：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¹。

現代意義上的摩尼教研究，即作為一個獨立領域，或獨立學科的摩尼教研究，實發端於二十世紀初吐魯番考古的大發現。其間摩尼教遺址遺物，尤其是數以千計的摩尼教寫經殘片的出土和確認，導出了摩尼教研究這一時代學術之新潮流。而促使這股潮流更加洶湧澎湃的，還有著名的敦煌藏書洞發現的唐寫本漢文摩尼教經和附近出土的突厥

* The Chinese Library,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Thailand

¹ 見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236。

文摩尼教懺悔文，北非阿爾及利亞特貝薩(Tebessa)出土的拉丁文摩尼教寫本殘片，埃及出土的科普特文、希臘文摩尼教紙草殘片，更有中國福建發現的摩尼教寺廟遺址以及其他摩尼教遺物。投身這股學術新潮流的學者，從傳統學科來說，包括了伊朗學家、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宗教學家、敦煌學家等等；從研究者所屬國家、地區來說，包括了歐洲、亞洲、北美洲、北非洲、澳洲諸多文化學術發達的國家地區。從研究者的身份來說，上述提到的各傳統學科的最權威學者，很多都涉獵了摩尼教這個領域，有不少更是以這個領域的研究而成名，或者本身就是該領域某一課題研究的先驅、奠基者。

摩尼教研究，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自然有其特定的內涵。就迄今各國學者所發表的論著的內容及其研究趨勢看，摩尼教研究的內涵，似可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是基礎研究，包括對各國現存古代典籍中有關摩尼教資料的發掘、整理、翻譯；對各地各個時期摩尼教遺址、遺物的發掘、考察、鑒定；對已出土的各種文字的摩尼教寫本的釋讀、校勘和翻譯。

其二是縱深研究，即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已知的資料，對摩尼教的創立，摩尼教主及其門徒的生平，摩尼教的教義、禮儀習俗、音樂、美術、書法，摩尼教的教會組織，摩尼教的東西傳播及其在傳播過程中的演變等等，進行深入的探討，還摩尼教以本來的歷史面目。

其三是比較研究，即在上述兩個方面的研究的基礎上，把摩尼教作為古代波斯、古代東方，以至古代世界的一種宗教、一種文化現象，與其他的宗教，尤其是瑣羅亞斯德教、基督教和佛教，與其他的文化現象作比較研究，探討其異同和聯繫，探討其對社會歷史造成的影響。

其四是綜合性研究，即將上述三個方面的研究成果，進行綜合概括，從而進一步發現並提出新的問題。

迄今發表的摩尼教論著，大體都離不開上邊四個方面的內容。但在實際研究過程中，這四個方面彼此之間是密切聯繫、相輔相成、互相推進的。一些學者或一些論著，可能以某一方面的研究為主，但往往也要借重其他方面的研究，同時對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有所貢獻。

儘管摩尼教研究涵蓋了多方面的內容，但任何實質性進展，從根本上看，還是取決於對新資料的佔有和運用。就這方面而言，對古籍中有關摩尼教資料的發掘、整理、翻譯，西方學者從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中葉，就已經進行得差不多了。例如敘利亞文獻中有關摩尼教的資料，已被英譯²和法譯³，拉丁文和希臘文資料已被整理出版⁴，阿拉伯文資料也早有英譯本⁵。至於中國，從本世紀初敦煌摩尼教殘經發現後，才開始注意古籍中的摩尼教資料。其間歷經蔣斧⁶、沙畹、伯希和

² 見C. W. Mitchell, *S. Ephraim's Prose Refutations of Mani, Marcion and Bardaisan* (London: 1912-1921, repr. 1969).

³ 參閱F. Cumont, *Recherches sur le Manicheisme, Vol. I, La cosmogonie manicheenne d'apres Theodore Bar Khoni* (Brussels: 1980).

⁴ 拉丁著作參閱J. Zycha,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Vol. XXV* (Sect. VI, Pars I, 1891, Pars II, 1892); R. Jolivet and M. Jourjon, *Six traites anti-manicheens. Oeuvres de Saint Augustin 17* (Bruxelles: 1961); 希臘文著作參閱Ch. H. Beeson (ed.), *Hegemonius. Acta Archelai. Die griechischen christlichen Schriftsteller der ersten drei Jahrhunderte, Bd. 16* (Leipzig: 1906).

⁵ B. Dodge, *The Fihrist of Al-Nadim* (New York: 1970); E. Saechau (trans.), *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Nations* (Lodon: 1879).

⁶ 蔣斧，〈摩尼教流行中國考略〉，載《敦煌石室遺書》、《敦煌拾瑣》(1909)。

7、王國維⁸、陳垣⁹、牟潤孫¹⁰、吳晗¹¹等的發掘，絕大部份已被找出引錄了。爾後學者發表的論著，雖不無增補，但為數甚少。近年找到的零星新資料，多是出自地方文獻。例如，八十年代福建晉江發現清嘉慶年間蔡永蒹撰的《西山雜志》，對當地的摩尼教有所提及，為前人所未引用¹²。亦有學者從地方族譜中，發現族人參加明教的記錄¹³等等。古代中國是世界最重視文史記錄的國家，不僅官方，而且民間也留下浩瀚的文獻史料。從正史和傳統典籍中雖難再找有關摩尼教記錄，但從地方著作中，或可發掘；尤其是華化的摩尼教——明教，曾於宋元年間盛行於兩浙和福建，如果能蒐集這一帶的地方文獻，特別

⁷ E. Chavannes et P. Pelliot, "Un traite manicheen retrouve en Chine, Deuxieme partie," *Journal Asiatique* (1913); 馮承鈞譯,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1928), 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八編》(北京:中華書局, 1958), 頁43-100; P. Pelliot, "Les Traditions Manicheennes au Fou-kien," *T'oung Pao*, vol. 22-23(1923-1924), pp. 193-208; 馮承鈞譯, 〈福建摩尼教遺蹟〉, 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八編》, 頁43-100。

⁸ 王國維, 〈摩尼教流行中國〉, 《亞洲學術雜誌》11(1921)。

⁹ 陳垣, 〈摩尼教入中國考〉, 《國學季刊》1: 2(1923), 頁203-239。

¹⁰ 牟潤孫, 〈宋代摩尼教〉, 《輔仁學誌》7: 1/2(1938), 頁125-146。

¹¹ 吳晗, 〈明教與大明帝國〉, 《清華學報》13(1941), 頁49-85。

¹² 《西山雜志》抄本今藏泉州海交史博物館，有關摩尼寺的記錄，承蒙該館文博專家李玉昆先生惠示如下：

草庵寺

宋紹興十八年，宋宗室趙紫陽在石刀山之麓，築龍泉書院，夜中常見院後石壁五彩光華。於是僧人吉祥募資琢佛容，而建之寺曰「摩尼寺」。元大德時，邱明瑜曾航舟至湖，格登摩尼寺，捐修石亭，稱曰草庵寺。明正統乙丑十年修。明洪天馨先生與吳象坤先後隱居於此。爾後佛會僧人謂摩尼非牟尼，遂置之荒蕪也；而龍泉菴則被清兵所毀。

¹³ 福州著名學者連立昌先生在福建霞浦縣蓋竹村林氏族譜中，查得該族有瞻公者，名不詳，於宋真宗天聖五年(1027)「棄俗入明教門，齋戒嚴肅」。

是民間族譜、家傳著述之類，細加檢索翻閱，當會有所收穫，對揭示華化摩尼教的真正面目必多所幫助。

不過，無論中外，史書典籍有關摩尼教的記錄，均屬教外人的手筆。欲窺摩尼教的廬山真面目，當以其教本身之遺址遺物為主。是以，考古發現的摩尼教資料彌足珍貴。本世紀初吐魯番摩尼教遺址遺物的發現，奠定了現代摩尼教研究的資料基礎。自公元一九〇四年德國語言學家米勒(F. W. K. Muller)，首次發表了吐魯番發現的摩尼教殘片後，迄今九十餘年，先後有幾十位學者長年累月地研究釋讀這些殘片的文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些殘片主要收藏於東柏林的科學院(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DDR)，故近年研究成果最豐者，當數該院的宗德爾曼(W. Sundermann)博士和齊姆(P. Zieme)博士。至於吐魯番摩尼教遺址的考察，主要見於當年各國探險家的報告。爾後幾十年，雖多有學者前往考察，但稀見加以系統地深入研究；直至八十年代，才有日本學者森安孝夫博士和中國學者晁華山教授在當地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協助下，紮紮實實地開展這一工作，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¹⁴。遺存吐魯番的諸多佛寺窟，原在公元九至十一世紀摩尼教盛行時，很可能是摩尼教寺窟。這一點，當年到此探險的西方學者已有所注意，有所報導。一九八八年九月，筆者與瑞典學者翁拙瑞(P. Bryder)博士到當地考察時，也發現有的寺窟，其外壁脫落，內壁顯現的中古伊朗文，有祈禱摩尼的詞句。顯然，這些寺窟原來牆壁所寫所畫的是摩尼教的內容，但後來寺窟被佛教徒佔有後，這些字畫被壁封了，在新的壁面上又繪以佛教的圖畫。因此，要想最後揭開這些二重窟之謎，要想在摩尼教

¹⁴ 詳見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ニ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第31-32卷合併號(1991)。晁華山，〈尋覓湮沒千年的東方摩尼寺〉，《中國文化》8(1993)，頁1-20。

資料上又有一次大的發現，看來得想辦法把外邊的佛教壁封取走，或直接用現代科技透視內壁的字畫；而這顯然是要假以時日的。

吐魯番的摩尼教文獻，中國學者也有所發現。在十年前發表的拙文〈本世紀來摩尼教資料的新發現及其研究概況〉中，就已特別提到前輩學者黃文弼先生的貢獻，其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吐魯番考古記》一書中，刊出了他所發現的一篇回鶻摩尼教文書的照片，而這篇文書於一九七八年為耿世民教授所釋讀發表¹⁵。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一年，新疆吐魯番地區文物管理所在清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遺址中，又得到了八件摩尼教文書，其中三件為粟特文，五件為古回鶻文；有兩件照片流出國外，經英國粟特文專家西姆斯·威廉斯(N. Sims-Williams)博士的鑒定，乃係摩尼教粟特文書¹⁶。較長的卷子長268cm，寬26cm，計135行，在現存摩尼教粟特文書中，數其篇幅最長、最為完整。其中間尚有精美的彩色圖畫：兩位守護神正在奏樂，拱護著象徵教主摩尼的一頂白色高帽，中間以粟特文書以金字「慕闍之光耀」。就這兩個摩尼教卷子，筆者曾在課堂請教過西姆斯博士，其言釋讀的難度極高。但最近獲悉，取得這兩個卷子研究權的日本優秀學者吉田豐博士已將其譯讀了，譯稿即將發表。

根據摩尼教的東傳歷史，我們已知其於三世紀末葉進入中亞地區，在中國西北地區的廣泛活動當不會遲於四、五世紀。而當九世紀中葉，唐政府迫害驅逐西來摩尼教後，摩尼教徒更是麇集西北，其存在持續至西北完全伊斯蘭化後，下限似可定為十三世紀。是以，摩尼教之在中國西北地區傳播，幾長達千年；以西北氣候之乾燥，其所遺

¹⁵ 見氏著，〈回鶻文摩教寺院文書初釋〉，《考古學報》1987：4，頁497-516。

¹⁶ R. N. Frye, "Manichaean Notes," in G. Wiessner and H. J. Klimkeit eds., *Studia Manichaica* (Wiesbaden: 1992), pp. 93-95.

下的文物當不止目前所發掘已知者。因此，我們可以預期，隨著西北的建設和考古工作的開展，日後還可能大有摩尼教資料出土。更有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資料可能早已出土，但我們並不知道其所屬為摩尼教。上述提到的一九八六年發現的最長粟特文摩尼教卷子，當初是被當為佛經報導。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國西北地區的文物單位，不知發掘收藏多少古代西域文字寫本，祇因為沒有專家鑒定釋讀，一直被封存著。其中或許也有摩尼教寫本。依筆者拙見，文化是人類所共有，學術更是超越國界，如何把學術非政治化、非商品化，通過有效的國際合作，儘快鑒定解讀這些寫本，以推動學術的深入發展，似是值得學人關心的問題。古代西域文字，中國前輩學者也有所研究，為國際所知名。但迄今為止，中國這方面的專家學者顯然是太少了。選派一批已掌握多種現代西方語言的年輕優秀學者到歐洲研習這些文字，似應提到議事日程。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柏林學院和徹斯特·貝蒂爵士(Sir Chester Beatty)在埃及開羅購得了一批古埃及紙草文書殘片，係用科普特文寫成。後來這些殘片部份被釋讀，認定為摩尼教文獻。到七十年代，在德國科隆大學蒐藏的古埃及紙草文獻中，又發現了希臘摩尼教寫本，即所謂科隆摩尼古卷(Cologne Mani-Codex)。上述這些紙草殘卷，原出土於埃及的麥地納·馬地(Medinet Madi)。到了近年，在埃及的伊斯曼特(Ismant)遺址的考古中，又有摩尼教遺物出土。該遺址在今達赫萊綠洲(Dakhleh Oasis 29° 00'E, 25° 20'N)，古代稱喀里斯(Kellis)，位於今開羅西南800公里處，面積為2.5公里×0.5公里。據考該地於公元四世紀末被風沙埋沒。遺址於八十年代中葉開始發掘，至一九九一年便報導發現了摩尼教的遺物。就已知的信息，這些遺物主要是文字資料，寫於紙草和羊皮紙，或刻於木板。所用文字有科普特文、古希臘文，和摩尼教徒專用的古敘利亞文，即伊斯特蘭琪羅文(Estrangelo)。內容包括摩尼教的讚美詩、

禮拜經文、教徒個人書信、微型細畫等。由於出土的殘片、木板甚多，數以千計，究竟有多少屬於摩尼教，具體的內容是甚麼，還有待專家仔細鑒定和釋讀。但無論如何，已確認的摩尼教遺物進一步證明了該教曾於公元四世紀在北非廣為傳播。目前發掘工作還在進行中，也許，埃及摩尼教遺物的又一次大發現已在醞釀中¹⁷。

近年令摩尼教學者為之鼓舞的，還有福建華化摩尼教遺物的連連發現。早在五十年代，吳文良先生便找到並考定了泉州城附近晉江華表山麓的元代草庵，實為摩尼教寺之遺址¹⁸，庵前摩崖石刻，勒有「清淨光明，大力智慧，無上至真，摩尼光佛」十六大字，是為華化摩尼教之真言。至一九七九年，晉江文博專家黃世春先生在草庵寺前二十公尺處發掘出宋代摩尼教徒使用的黑釉碗，上刻「明教會」三字¹⁹。一九八八年六月，莆田市涵江區陳長城先生在當地發現了元末明初的摩尼教斷碑，刻有「大力智慧 摩尼光佛」八個楷書大字，上端尚有「明」、「真」兩字的殘蹟²⁰。該碑的部分殘闕也於一九九〇年末在附近地方出土，珠聯璧合，確證了原碑所刻文字正與草庵摩崖石刻相同²¹。一九九二年學者又在莆田縣北高鄉後積村，發現了一塊內容一

¹⁷ 有關喀里斯摩尼教遺物的發現，參見，I. Gardner, "A Manichaean Liturgical Codex Found at Kellis," *Orientalia*, 62:2, Fasc. 2(1993), pp. 30-59; "Personal Letter from the Manichaean Community at Kellis" (在第三次國際摩尼教學術討論上宣讀的論文，未發表)；"The Manichaean Community at Kellis," *Manichaean Studies Newsletter* II(1993), pp. 18-26。

¹⁸ 吳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頁44-45。

¹⁹ 黃世春，〈福建晉江草庵發現明教會黑釉碗〉，《海交史研究》1985：1，頁73。

²⁰ 陳長城，〈莆田涵江發現摩尼教碑刻〉，《海交史研究》1988：2，頁117-118。

²¹ 程德魯，〈涵江又發現摩尼教殘碑〉，《湄洲報》1992.6.12。

樣的石碑²²。福建摩尼教遺址遺物的發現，為研究摩尼教在中國的華化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²³。其勒石為記，弘揚本教要旨，正是效法中國儒家和早已在中國紮根的佛教的做法。該教在唐會昌年間遭敕禁，其呼祿法師，潛逃至福州，建立新的傳教基地²⁴。爾後，史籍有關福建摩尼教的記載，不絕如縷。如是，上述遺址遺物之出土，絕非偶然，今後必將還有新的發現。假如能刻意根據地方史誌提供的線索，尋找發掘摩尼教徒的墳墓，當更有驚人資料可期，或可填補國際摩尼教研究的空白。

根據史籍的記錄，宋元時期，摩尼教也流行於浙江地區，尤以溫州、台州、明州為甚。依理類推，浙江當也應像福建那樣，保有摩尼教之遺址遺物。由於當地文史工作者的努力，在這方面已見績效。一九八九年，浙江平陽縣學者林順道先生刊文，報導其尋覓溫州蒼南元代摩尼教寺「選真寺」遺址結果²⁵，令人注目。選真寺與華化摩尼教有密切的關係，確定其遺址所在，並在周圍發掘，或可有所收穫，就如草庵寺那樣。同年，又有學者邢松棋先生報導浙江文成縣西北樟山摩崖造像，考證其為「元代明教徒的一種祭天儀式和祈願」²⁶。該造像是否果屬明教徒之物，雖有待新資料的佐證和進一步的考察。但如此摩崖造像，表明當地曾存在與傳統道教和佛教不同的宗教信仰。類似的造像當曾見於紙張或他處石刻，期有新的發現以助考證。

²² 鄭旭東，〈我市發現第二塊摩尼教碑〉，《湄洲報》1992.6.16。

²³ 有關福建摩尼教遺址遺物的概述考證，詳見拙文《福建發現的波斯摩尼教遺物》，《故宮文物月刊》133(1994)，頁110-117。

²⁴ 詳參拙文〈宋代明教與唐代摩尼教〉。

²⁵ 林順道，〈蒼南元明時代摩尼教及其遺蹟〉，《世界宗教研究》1989：4，頁107-111。

²⁶ 邢松棋，〈樟山摩崖造像析證〉，《中國文物報》1989.11.17(第45期)，第三版。

綜觀近百年來的摩尼教研究，最使學者興奮的，自然是摩尼教遺址遺物的出土，任何一件新發現都會引起強烈的反響。但最吸引學者並費學者最大工夫的是對出土的摩尼教各種文本殘卷的研究。迄今發現的摩尼教寫本，採用了多種文字，包括古敘利亞文、希臘文、漢文、新波斯文、阿拉伯文、中古波斯文、帕提亞文、粟特文、大夏文、回鶻文、吐火羅文、科普特文等，其中好幾種早已失傳。摩尼教徒的經文，不僅譯成多種文字，而且採用了不同的寫體，而遺存下來的，又多是零星殘片，斷句殘缺，這就更增加了了解的困難。爲了釋讀這些殘片，學者們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儘管早年發現而未被釋讀的殘片尚多，但畢竟已取得了輝煌的成果，隨著文獻的不斷發現和釋讀，學者也逐步把研究深化，越來越趨向於比較研究。即將不同文字寫本的摩尼教經，從所用的術語詞彙到經文內容進行比較對照，找出其彼此之聯繫，探討其版本的源頭。術語詞彙的比較，可以瑞典翁拙瑞(P. Bryder)和日本的吉田豐近年的著作爲例，他們將漢文摩尼教經中的一些佛化術語和音譯詞彙，在帕提亞文、粟特文等其他文字的摩尼教經中找出對應的詞語，以論證兩者之衍化²⁷。內容的比較可以德國宗德爾曼教授爲例，其在一九九〇年六月隆德大學舉行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將伯希和法譯，今藏北京圖書館漢文摩尼教殘經與帕提亞文、回鶻突厥文和埃及科普特文的一些殘片作比較，企圖找到該經的原始出處²⁸。

²⁷ P. Bryder,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Manichaeism: A Study of Chinese Manichaean Terminology* (Lund: 1985); 吉田豐，〈漢譯マニ文獻における漢字音寫された中世イラン語について(上)〉，《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神戸市外國語大學外國學研究17)(1986)，頁1-15。

²⁸ 講演題目爲：Übersicht über die parthische Version desmons。參閱氏著，*Der Sermon vom Licht-Nous. Eine Lehrschrift des ostlichen Manichäismus-Edition der parthischen und soghdischen Version = Berliner Turfantexte XVII* (Berlin: 1992)。

上述這種比較對照的方式，無疑是將摩尼教文獻的研究提高到一個更高的層次。各種文本的摩尼教經，是研究摩尼教古代各地區、各民族傳播的第一手資料。對這些文本的比較研究，將為研究摩尼教在各地、各族、各個時期的演化提供最為可靠的根據。並將日益成為摩尼教研究的一個重要模式。由於現存各種文本的摩尼教殘卷中，漢文本居最完整、最有份量之位，因而摩尼教文獻的比較研究，如果離開了漢文本，就勢必黯然失色。是以，中國學者在這方面亦必將起著重要的作用。

竊以為與上述摩尼教文獻比較研究有密切關係，並值得中國學者進一步投入的是，摩尼教本土化的研究；前者乃為後者的基礎。我們業已清楚，歷史上的摩尼教，源自波斯，西傳直達地中海西岸，東漸直抵中國東南沿海，地跨歐、亞、北非三大洲，流行的時間歷逾千年。摩尼教能跨越如此時空幅度地傳播，與其因應天時、地利、人和之迥異而改變自己的面貌是分不開的。本世紀來，學者從各地摩尼教文獻的比較中，已越來越清楚地揭示了摩尼教在東西傳播中的變化。而由於摩尼教在中國的傳播時間最為悠久，當摩尼教在西方早已被基督教、伊斯蘭教所撲滅之後，摩尼教雖遭會昌之厄，仍在中國東南沿海傳播了幾百年。因此，如果要解剖摩尼教在各地演化的歷史過程，把中國作為典型自是最佳的選擇。對於摩尼教在中國的華化，本世紀初沙畹、伯希和的著作就已注意到，有所提示；但囿於資料限制，未能多加闡發。近年中國大陸和台灣學者都非常重視這個問題²⁹。可以預言，隨著中國學者對其他文種摩尼教文獻的深入了解，隨著福建、浙

²⁹ 參閱拙文，〈宋元時代中國東南沿海的寺院式摩尼教〉、〈宋代明教與唐代摩尼教〉、〈從明教遺物看波斯摩尼教之華化〉，見《古代摩尼教藝術》（台北：1995）。王見川，〈從摩尼教到明教〉（台北：1992）。

江摩尼教遺址以及地方史料的再發現，對摩尼教華化問題的研究，必將有更大的突破。

中國學者有可能大做貢獻的另一課題，恐怕是回鶻摩尼教的研究。在古代世界中，回鶻是把摩尼教奉為國教的唯一民族。九世紀中葉，其西遷建國高昌(吐魯番)後，仍繼續奉摩尼教達三、四百年之久。本世紀初及爾後在吐魯番所發現的摩尼教資料，便是回鶻摩尼教的遺存。在整個摩尼教研究領域上，回鶻摩尼教是最為學者所矚目的一顆明珠，這至少有如下幾點原因：

其一、摩尼教在回鶻人中的傳播，是摩尼教史最燦爛的一頁，因為其作為回鶻的國教，不僅曾借助統治者的政治、軍事勢力，在中國內地傳播，而且曾抗衡伊斯蘭教對突厥斯坦的擴張。可以說回鶻摩尼教已成為一個道地的政治宗教。

其二、以政治宗教為背景，回鶻摩尼教擁有獨立的寺院經濟，這已為出土的摩尼教寺院文書中所確證，是為其他地區的摩尼教所鮮見。

其三、回鶻摩尼教位於古代中西交通大道絲綢之路的要衝。其既受到中西文化之衝擊，也對中西文化產生了影響。其構成了絲路文化史的一個重要內容。

其四、有關回鶻摩尼教，不僅保有最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即該教的遺址遺物；而且也有不少的二手資料，即中外史籍的記錄。

基於上述原因，對回鶻摩尼教的研究，包括文獻釋讀、寺窟發掘和考證，史料整理，綜合考察等，近年似乎已成一股熱潮，不少知名學者都投身其中。與宗德爾曼教授齊名的德國齊姆(P. Zieme)教授，釋讀了大量的回鶻文摩尼教文獻；還有德國的克里木凱特(H. J. Klimkeit)教授，比利時的通格魯(A. Van Tongerloo)教授等，也都對回鶻文摩尼教文獻做了大量的研究。至於中國，除了上邊提到的耿世民、晁華山教授

外，還有李經緯、楊富學³⁰等學者，也先後發表了專門研討回鶻摩尼教文獻的論文。不過，就各國發表的有關回鶻摩尼教論著看，能站在歷史的角度，從考察回鶻摩尼教的遺址、釋讀回鶻摩尼教自身文獻，又借助中外史籍的記錄，對回鶻摩尼教作系統研究最有成績者，當推上面已提到的森安孝夫之《回鶻摩尼教史之研究》³¹。

儘管學界對回鶻文摩尼教的研究已卓有成就，但已有的回鶻摩尼教資料尚有許多未釋讀，而且不時又有新的發現，考古發掘還大有潛力。即使對現存寺窟的研究，亦未有窮期。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說，回鶻摩尼教研究尚大有可為；尤其是對於佔有地利、人和的中國學者來說，更可望有獨特的建樹。

古代中國既然是摩尼教的一個重要傳播地區，中國學者在摩尼教研究領域上的貢獻和作用，自然也就是多方面的。上述僅從發展潛力的角度，擇要略作展望。然而，中國學者不管從事哪一點的研究，都不能與國際摩尼教研究脫節。正如當年陳寅恪教授所告誡吾人：「今世治學以世界為範圍，重在知彼，絕非閉門造車之比。」³²治摩尼教更是如此。

摩尼教作為一個世界性宗教，跨越那麼大的時空，對其研究，自始就帶有國際性。而本世紀來摩尼教遺址遺物的大量出土，尤其是各種語種的殘卷的發現，益使摩尼教研究不是某一地區、或某一學科的

³⁰ 李經緯，〈古代維吾爾文獻《摩尼教懺悔詞》譯釋〉，《世界宗教研究》1982：4，頁57-78。楊富學，〈巴黎藏敦煌本回鶻文摩尼教徒懺悔文譯釋〉，《敦煌學》16(台北：1990)，頁41-45。楊富學，〈一件珍貴的回鶻文寺院經濟文書〉，《西北民族研究》1992：1，頁59-65。

³¹ 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撰有〈森安孝夫著《回鶻摩尼教之研究》評介〉，《西域研究》1994：1，頁99-103。

³² 〈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見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317。

學者所能勝任，其亟需各國多種學科的學者攜手協力。這種國際合作，隨著人類進入資訊信息時代而日益緊密，特別是到了本世紀八十年代。一九八七年八月五日至九日，在瑞典隆德大學(Lund University)舉行了首屆國際摩尼教學術討論會。出席這次會議的，除了作為東道國的瑞典學者外，還有聯邦德國、前民主德國、英國、比利時、美國、丹麥、意大利、中國等的學者。會議除了宣讀、討論二十多篇摩尼教專題論文外，還決議成立了國際摩尼教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ichaean Studies)，並正式建立常設機構，出版《摩尼教研究通訊》³³。在該學會的策劃推動下，一九八九年八月九日至十日，在德國波恩聖·奧古斯丁(Sankt Angustin)舉行了第二次國際摩尼教學術討論會；與會學者，除了第一次會議那些國家之外，還有來自尼德蘭、奧地利、瑞士、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等國。一九九三年八月卅一日至九月五日，在意大利卡拉布里(Calabria)又舉行了第三次國際摩尼教學術討論會，會議期間宣讀討論了各國學者的三十五篇論文³⁴。第四次國際摩尼教學術討論會也已預定在一九九七年舉行。從八十年代以來，還舉行過許多規模較小的國際性摩尼教專題討論會。就筆者所知，意大利舉行過兩次，專門討論科隆摩尼古卷；而開羅、羅馬、比利時盧文(Leuven)等，都先後舉行過專門會議，討論埃及科普特文獻的研討會；倫敦皇家亞洲學會、瑞典隆德大學等，也主辦過多次專題討論會。還有，在多次大型的國際性宗教學會議、東方學會議上，也往往有摩尼教專場。

本世紀來，用各種文字撰寫發表的摩尼教論文專著，數以千計；至八十年代後，更接二連三地出版國際性的摩尼教研究論集。諸如西

³³ *The Manichaean Studies Newsletter*, Leuven (Belgium),迄今已出版12期。

³⁴ 是次會議論文集尚未出版。

里羅(L. Cirillo)主編的兩屆摩尼古卷國際研討會論文集³⁵，翁拙瑞(Peter Bryder)主編的《第一次國際摩尼教學術討論會論文集》³⁶，威斯納爾(G. Wiessner)和克里木凱特(H. J. Klimkeit)主編的《第二次國際摩尼教學術討論會論文集》³⁷，還有通格魯(A. Van Tongerloo)和吉弗桑(S. Giversen)主編的《紀念賴斯教授七秩華誕摩尼教研究論文集》³⁸。正在編輯、排印的論文集則更多。

目前在國際摩尼教研究學會的協調組織下，還在推進兩項重大的國際綜合性研究計劃。其一是將各國蒐藏的各種文字的摩尼教殘卷，都轉化為可讀的符號，輸入電腦，建立統一的摩尼教文獻電腦資料庫，俾便學者檢索、比較、閱讀。這一工程如完成，估計所收入的資料，可印成約五千頁的A4紙張。其二則是編纂摩尼教專用術語大辭典，預計收入辭目約一千條³⁹。這兩大項目的完成，實際就是二十世

³⁵ L. Cirillo ed, *Codex Manichaicus Coloniensis, Atti del Simposio Internazionale* (Rende-Amantea, 3-7 sett. 1984) (Cosenza: 1986), and L. Cirillo ed., *Codex Manichaicus Coloniensis. Atti del Secondo Simposio Internazionale* (Cosenza, 27-28 maggio 1988) (Cosenza: 1990).

³⁶ P. Bryder ed., *Manichae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ichaeism* (August 5-9, 1987,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Religions, Lund University, Sweden) (Lund-Plus Ultra: 1988).

³⁷ G. Wiessner and H. J. Klimkeit eds., *Studia Manichaica II. Internationaler Kongress zum Manichaismus* (August 6-10, 1989, St. Augustin/Bonn,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92).

³⁸ A. Von Tongerloo and Soren Giversen eds., *Manichaica Selecta: Studies presented to Professor Julien Ries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Lovanii: 1991).

³⁹ 參閱P. Bryder, "Worldwide Cooperation on Manichaeism," in Gun Lauritzson ed., *Cooperation East and West-Continued* (Lund: 1994), pp. 12-17.

附註：文中所提到的拙作，除註明出處外，均收入拙著《摩尼教及其東漸》（北京：中華書局，1987）。該書台灣增訂版將由台北淑馨出版社刊行。

紀摩尼教研究的終結，也標誌著摩尼教研究將以嶄新的面目，跨進廿一世紀。

Manichaean Studies: An Overview

Wu-shu Lin

The Chinese Library,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Thailand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Manichaen studi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specially since the eighti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is field which resulted from the new important discoveries of Manichaean materials, and makes some proposals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Chinese Manichaeism in the light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Manichaeism, China